

◎楊宗翰

從「舊」談起：「新世紀文學」的侷限與可能

今人提倡「新世紀文學」這個概念，

正反諷地映照出「現代性」幽靈的魅力未曾或減，

我們或許該回頭看看自己的原居地，

重新把它視為一個「問題」，

藉此開展「新世紀文學」真正的可能性。

西元兩千年。

「我們正活在一個新時代(new times)裡」，這信念幾乎成了一種魔咒，反覆烙印著你我的集體潛意識。既然要和自己的過往毅然揮別，所有關於「新」的論述也不甘寂寞一一湊攏，像晚會上施放的各式煙火，爭出頭。近例一：長期佔據流行排行榜首的「後現代」，現在已被「後(Post)」了不只一回；遠例一：五、六〇年代不但叱吒風雲也召盡罵名的「超現實」，在我們的現代詩人們「一超再超」一下，終至超越了當年讀者群的期待視域，只好自行遁入不設觀眾席的馬戲秀場。眾生往往只記得晚會有煙火爭妍鬥豔，哪會思及晚會後剩炮屎灰盡煙散，踐踏隨人。

潮來潮去，多少弄潮兒淹死在下一波猝不及防的浪頭裡。

1

將「新」視為強勢主導論述(dominant discourse)此一聲稱，在台

灣的文學發展史上顯然早已「不新」。那種追求進步、提倡創新與變革、崇尚進化發展的觀念或心態，不只成為日治台灣或晚清中國鮮明的歷史標記，在西方經歷了十七世紀末的「古典與現代論爭」而終結了對古典的盲目崇拜後，一樣也主導著往後數百年的歷史進程。以上所論，學界人士通常以「現代性(modernity)」一詞稱之。

現代性？在這個連「後」後現代(post-postmodern)的口號都已不再能引起多少新奇感的文壇，老調又豈能重彈？要彈也該彈餘溫猶存的「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免遭前朝遺老之譏才是——就像本文欲論「新世紀文學」，又何必硬要從「舊」談起呢？還請讀者不要見怪，敝人雖然敬佩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對現代性方案的堅定捍衛，但始終不願也不能成為他的信徒或追隨者。事實上，這篇文章和他的學說恐怕沒有多大的關係。筆者當然也不會在這樣的篇幅裡，試圖羅列「後／現代性」的紛紜諸貌。我所思考、關注的其實是：在台灣這塊文學場域，現代性的幽靈是如何緊緊咬住所謂「新世

紀文學」的衣領？作為一個活在此一時空的書寫／閱聽者，又該如何批判、反思「新世紀文學」概念的洞見與不見，進而尋獲一己藏身／長生之道？

會有如斯的提問，自不是事出無因。筆者去年年底因為一些機緣巧合，為「報齡」相當年輕的晚報《勁報》規劃一個新的版面。鑑於彼時的晚報上幾已完全不見文學性副刊的生存空間，而幾份日報的副刊不是水準停滯不前，就是越來越走向學院化與廟堂化，我決定將這整個版面保留給文學副刊，提供文學／文化批評與創作一個自由的園地。也因為要配合這份報紙的一些特點（晚報的即時性與商業性、全彩印刷與非常大膽的編排方式），在創刊之前筆者特別對編輯與審稿取向思考再三，期能與坊間現有的各大副刊有所區隔。基本上，拒絕學院化或意識型態檢查、摒除人情羈絆與聲名高低考量、標舉「詩無長短只有好壞」信念、提供異端書寫與實驗作品的發表空間等等，大抵就成為《勁副刊》這些日子以來的守則或說是理念。也因為自身除設計專欄、規劃版面配置外，尚負責部分稿件的審閱，從一九九九年年底迄今，一路走來的確也看了不少的稿件。我的心情卻未隨之振奮高揚，反倒是被深深的不安所困。我的不安，正來自這些從四面八方投遞而至的稿件。當然，我並不是說這些寫作者的心血結晶多麼差勁或不具水準（我頑固地相信：當坊間還有很多副刊編者用字數多寡與題材是否甜美可口作為選稿標準時，台灣就沒有一名副刊編輯有資格用「水準」這個詞來衡量來稿的輕重）；相反地，寫作者的字斟句酌讓副刊上偶現之錯漏字更顯出編校者疏失的不可饒恕。令我不安的真正來源，是這些稿件在「內容充實、技巧平穩」（這幾乎是大多數能在副刊上發表的詩文之共同「特色」）之外，似乎還缺少了點什麼：

一種不願被輕易馴化、生猛不羈的書寫與想像？

或擬魯迅一句：「不被坊間各大老牌副刊馴化的書寫人，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2

無論是新世紀還是舊世紀，媒體對作家寫作取向的影響力同樣相當

可觀。作者如此，讀者何獨不然？儘管你如何使用「文本」一詞取代今日疲態盡露的「作品」，也無法改變自己眼下所及的「文本」，實多已遭媒體編輯們的介入形塑。應該這麼說：當「稿約」、「專欄」、「邀稿」的訊息傳達出去那一刻，寫作已經開始。一隻隻不屬於作家的手，正辛勤地為最後的人造品（artificial）打拚工作。如果我們曾經視「作品」為讀者與作者間的溝通橋樑，現在最好將「媒體」當作另一座橋，或視為那勞苦功高的設計人與造橋者。這讓筆者想起傅科那段闡釋大學體制（the university institution）與文學間之關係的談話：

在所有敘述作品間，為何其中有一些會被神聖化，被視為「文學」來發揮功用？它們和一個與原先非常不同的體制即刻產生了關係：大學體制。現在它開始被視為與文學體制同為一物。

……
在此我們已經獲知了某些事實：那就是文學透過選擇、神聖化與制度的合法化之相互作用來發揮其功用，大學在其中既是操作者，也是接受者。

（《The Functions of Literature》，p.308-9）

引文中的「大學（體制）」幾乎完全可用「副刊」或「媒體」一詞瓜代之。

不過這並不代表筆者贊成那種觀點：將副刊／媒體與寫作者視為水火不容的敵對兩方，或把副刊／媒體描述成托辣斯帝國或「老大哥」式的監控體系；相反地，筆者認同傅科的說法「不存在任何沒有反抗的權力關係，反抗是更為真實和更為有效的，因為它們正好形成於權力關係得以實行的點上」（《Power/Knowledge》，p.142），「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反抗。然而，或者更正確地說正因如此，對權力關係而言，反抗從來就不是外在的。……（權力關係的存在）有賴於眾多的反抗：在權力關係中，這些反抗扮演著敵人、攻擊目標、支撐或把手的角色。這些反抗在權力網絡中無所不在」（《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 I: An Introduction, p.95）。換言之，本文立意不在於提倡對副刊／媒體全盤性的抵制或反抗——那種輕易而粗暴的運

動策略，注定只會製造出一堆無關緊要的鬥爭犧牲品。

我要請讀者思考的是：該如何運用可以掌握的工具、技法與策略，(再)生產/搞歪既有的「權力空間」？如何讓由此而產生的酷異/變種/怪胎文本在其寄居的媒體中一再衍/延異？如何善用「作者的名字」不斷自我調整之百變魅影，挑逗媒體與讀者/閱聽人的分類/閱讀習性？(傅科將「作者的名字」之存在視為「功能性的」，因為它可以作為一種「分類的方式」。見《What Is an Author?》，p.123)

3

讓我們藉此開展「新世紀文學」，真正的可能性……。

容筆者再度提醒：今人提倡「新世紀文學」這個概念，正反諷地映照出「現代性」幽靈的魅力未曾或減。坊間多少「後馬」、「後現代」或「後殖民」爭先清倉拋售，樂於追隨、採買時潮夕浪者，往往難以下心來回頭看看自己的原居地。我們或許不該期待那棄置多年的原居地還會存留什麼稀世珍奇，但重新把它視為一個「問題」，藏寶圖

說不定就在那裡。

別忘了，回頭找找「現代性」，找找它的「問題」。

引用書目：

- Foucault, Michel. 《What Is an Author?》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Donald F. Bouchard. Ithaca: Cornell UP, 1977. 113~138.
-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307~313.
- 《The Functions of Literature》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Ed. Lawrence D. Kitzma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 1990.

◎蒙天祥

「龍」不是dragon

龍是靈物，
是中華民族所獨創獨有的，
外國根本沒有此一靈物，
它如何能等於dragon？

大陸考古學家最近在河南省的出土文物中，有了重要的發現，證實距今六千年以前，中華民族就有了「龍」的圖形，那是用石塊排

成的，龍身有幾公尺長，龍頭龍尾俱全。由此推論，「龍」進入中國人的心中，佔有地位，應該比黃帝還要早一千年。有關龍的起